

朱亚非著

明代 中外 关系 史 研究



济南出版社

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济 南 出 版 社

(鲁)新登字14号

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朱亚非著

责任编辑：赵钟云
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251号)

封面设计：侯文英
新闻出版导刊社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50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80572—808—9/k·39

定价：9.00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序

朱亚非同志系山东大学历史系七八级本科毕业生，后追随郑鹤声教授、张维华教授攻读中外关系史，于1985年研究生毕业并获硕士学位。是郑教授的一名关山门弟子。近几年，他通过认真读书，潜心研究，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除刊发多篇论文外，又完成了《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专著的撰写工作。其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在同龄的学者中是比较突出的，十分可喜可贺。1985年以来的这段时间正是我国改革进入深层次发展的阶段，亦如政治领域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一，学术领域尤其是基础科学的研究同样遇到了许多来自社会环境方面的消极因素干扰，读书无用，急功近利，由一切向钱看而导致的出版难等种种错误思想、风气和销蚀剂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的头脑。在此情况下，有不少意志不坚的人发生了动摇，有的安于沉沦，无所事事，有的改行经商或从政，直至前不久，热衷于“下海”搞所谓第二职业者，仍大有人在。朱希祖先生曰：“学问之成绩，不可侥幸致也”，

“积数十年之搜讨研究，不旁鹜于势耀，不耽逸于声华，尚未知能成与否。”学问成绩之取得如此之难，三心二意，见异思迁，一暴十寒，一身而二任，成绩能从天上掉下来，或从地上冒出来吗？可喜的是亚非同志没有出现上述一类问题，相反，还颇有十年寒窗苦的精神，作出了比较不错的成绩。强将手下无弱兵，名师出高徒，亚非同志的为人为学及其所得的成绩，来源于我党和政府的教育成功，同时与我国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华影响和郑老教授的亲身教育熏陶，有十分重要的关系。为了使读者更具体了

解亚非志学问的师承关系，同时也为着进一步针砭、鞭策自己，和规劝、鼓励亚非同志更好地了解传统，追踪先哲、业师，在学术上作出建树，特此就郑鹤声教授的学术渊源和清代乾嘉学派的治学宗旨、特点及其贡献作一简略的汇报。

郑鹤声教授乃我国老一辈著名学者之一，精研中国近代史、中西交通史、目录学、史科学和明清史等均卓有建树，著述近2000万言。先生原受教于我国东南杰出学者柳诒征之门，与缪凤林、向达等于二十年代初同时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东南大学。时，柳先生主持该校国学和史地学讲坛，负有威望，郑、缪、向等倾心向学，学业突飞猛进，参加了柳先生倡建的“史地研究会”和“史地学会”，负责该会机关刊物《史地学报》的编辑工作。在学问上，秉承柳先生旨意，师法清代乾嘉学派，崇尚考据而又有所发展，学术界习称之为“南高派”。所谓“南高派”实际上是与当时北大胡适所领导而有傅斯年、陈寅恪等巨子参与的一个影响更大的学派相对而言的。在新中国建立前，北南二派都崇尚考据，都以绍述乾嘉统绪自期，在当时的史学界占有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过去一般认为考据学的最大特点便是格外重视史料，甚至把史料的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地位，如当时颇为流行的口号说：史料即史学，无一字无来历，有几分材料便下几分结论，甚至只摆出材料，不下结论，让材料自己说话。还听童书业教授说过，胡适认为证考一个字的来龙去脉，有时有可能比发现一颗恒星的贡献还大等等。过去批评考据学的另一个方面便是繁琐考证，一物之制度，一字之义理，辨证动至数千言。人们认为过于繁琐，没有必要。个人认为考据这门曾统治过中国学坛数百年的显学，存在过一些流弊。但在整理我国古代文献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考据学者在立身行事和治学精神、方法等方面亦有许多值得吾人学习继承的宝贵东西。特

此提出来与亚非同志共商共勉。

第一、为学要重视师承。所谓师承是指虚心学习包括自己受业导师在内的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和科学成果。清代考据学是师承汉代许郑之学而与宋学相区别的，所以又名汉学、朴学。宋人解经有其高明之处，但臆断之处时有所见。如朱熹的《大学章句》中有“右经一章”说：“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朱熹的时代距孔子已近二千年，他断言大学里那段话与孔子、曾子的关系，毫无真凭实据，戴震还在读私塾时，便一眼看了出来，且问得私塾老师无言以答。像这类主观臆说，汉儒决不存在。相反，因汉代“去古未远”，汉儒解经释字，又十分谨严，重师承，守家法，所以考据中吴派得出倾向是“凡古必真，凡汉必好。”皖派戴震提出的见解则更进了一步，也更科学了。戴氏发现“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附会。”因此，他所确立的宗旨是“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一切以求真求是为依归，既重视师承，又不盲从迷信；既树立自信，又要随时警惕妄自尊大，固步自封，抱残守阙，以至敝帚千金。戴氏还曰：“立身守二字曰‘不苟’，……事事不苟，犹未能寡耻辱……此数十年得于行事者”。这种实事求是，时时事事一丝不苟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吗？

第二、立为人为学之本，志存高远，胸怀广阔。考据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为学人立身行事树立了两大目标，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他还引用宋人刘挚的话说：“士当以器识为先”。戴震曰：“君子务在闻道”。为了笃志谋道，他提出了许多要与自己的堕性或鄙陋之心作斗争的方面。“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一也。不“撻击前人以自表爆”，亦不“依傍普儒以附骥尾”，二也。“私智穿凿”，虽不撻击前人，其失于闻道则同，三也。“积非成是而无以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等，四也。不甘寂寞，随

人俯仰，留恋“世俗之学”，五也。所以，根据考据大师的治学精神和高尚情操，士子必须做到：不随流俗浮沉，不受社会任何消极因素干扰，不为外物牵累，惟专心致志，进德修业。顾炎武、戴震二大师成就如此惊人，可是，他们的科场遭遇却都是很不幸的，顾氏一辈子仅是一个诸生，戴氏四十岁时始领乡荐成举人，其后会试屡屡落第，直至死前第二年才由皇帝赐了个同进士出身。且其大半生全是在穷愁潦倒中度过的，有时甚至饥粥不继，但仍废寝忘食，孜孜不倦。这是前哲敏勉求学，在淡泊名利方面的特立独行，十年动乱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是格外巨大的，许多人心灰意懒，思想混乱，于是搞空头政治者有之，改行者有之，混日子浪费时光者不乏其人。但郑先生却依旧每天闭户读书，手不释卷，好像世界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单是三千卷的《明实录》就通读了两遍，摘抄资料达数百万言。这种挚着追求，锲而不舍，在任何社会干扰和外物挑战面前都毫不动摇的坚忍不拔精神又是何等的可贵。

第三、博学多师，广求征信。考据学家深病宋明道学学者空谈性命，不务实际，且在解经方面臆度滋多。因此，最先在训诂学上提出“无征不信，且不以孤证为足”的目标。随后不久，这种精神便被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至于怎样广求征信从顾炎武所著《音学五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文集看，几乎可以说没有止境，也没有限量。如《日知录》一书，纪晓岚称其“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潘耒盛赞其“有一疑义，反复参考……有一独见，援古证今。”总的特点是博综通贯，引证浩繁。但他自己却常悔恨“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到了戴震之时，根据顾氏的丰富成果结合自己的长期研究，总结出考据学的研究要求应以达到“十分之见”为最高境界。他自己的

研究水平有达到了十分之见的，亦有未至十分之见者。什么叫十分之见呢？他说：

“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含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必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见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而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

这是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中的一段带总结性的话。根据这段话看，学者必须不折不扣地作到下列十点才算达到了学问的理想境界：第一、以古证古，以当时材料证当时的事；第二、当时留下的材料亦有精粗真伪问题，有完全符合实际并反映本质的，亦有违背、夸大、缩小或不反映本质的，这便需要就材料考证，求其在道理上说得通；第三、大小问题，都得考究，以推进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第四、弄清来龙去脉，实行纵向取证；第五、不轻信传闻；第六、不择众说以裁优劣，定是非，务求自己深入虎穴，躬行实践；第七、不驾空立言，必从详实材料中引出结论；第八、不以孤证举例立言；第九、不满足于循流探源，还要弄清渊源导流的趋向和规律；第十、不满足于对题问的从根达杪和由本到末的直线和主干探寻，而且对主干派生出来的枝肆问题，亦作一一搜讨。像这类周全缜密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

最后，还得谈一谈个人对《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一书本身的印象。中外关系史在史学界是个边缘学科，它还没有像某些纯基础学科一样有时遭到冷遇，面临传宗接代的威胁，因此，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全面而专门研究一个朝代的中外关系史，这还是第一部。由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历时长，难度大，且尚能保持常盛不衰，研究已达到的水准比较高，曾经沧海难为水，这便为新的尤其是青年学者的研究增加了难度。如果作者不愿意下

些苦功夫，并匠心独运，则其结果不是因袭前人，传拟贩转，便是施奇走怪，胡说八道，追求所谓新的突破。二者表现不同，其最后命运必然都是黄花朝露，不经风霜之物。就是说，任何作者著书立说，首先都面临一个正确理解和处理继承和求新的关系问题，可喜的是此作从整体结构、布局到各个具体部分的素材、见解到处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再细察各个具体问题的论述，前人的科学成果又大都有所继承，没有戴震所深戒的轻率对待前人成果“以自表襮”，或依傍前人“以附骥尾”等两种看来似乎相反而实质相同的毛病。其次，此作在着力探讨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同时，顺乎自然地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提供若干借鉴，以服务于今天的改革开放。如明代涉外关系的变化轨迹及其原因，明代中日关系的经验教训，明初外交使节的成功奥秘等等，充分揭示此著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学性，而且在理论联系实际和古为今用方面作了许多探路工作，富有时代感。

此著全编约二十五万言，具有求实求新，理论联系实际等不少优点，而没有出现时下许多出版物所存在的种种纰漏。作为一部青年学者的处女作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确实难能可贵。但同时也发现个别问题，作为一部系统研究明代中外关系史的书，尤其是作为第一部断代专史作品，似乎应该既鸟瞰当时中外关系的整体以至各个方面的全貌，同时又着重深入研究至今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命题，才显得更为完美无缺。就是说，此著在处理述与作的关系，一般与重点的关系的问题上尚未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在解决一系列重点深入并能显示作者的求新精神方面作得比较成功，在鸟瞰概述明代中外关系全貌方面稍显薄弱，这仍是需要作者今后继续努力解决的。

黄冕堂

1993年5月24日

目 录

序.....	黄冕堂(1)
导言.....	(1)
第一章 明朝对外政策、外事机构与外	
交使节.....	(6)
明初外交政策制订及发展演变.....	(6)
四夷馆、市舶司与会同馆.....	(22)
从郑和下西洋看明初外交格局.....	(39)
明初外交使节述评.....	(50)
第二章 明代与日本的关系.....	(67)
明代中日贸易简论.....	(67)
翺祥与策彦周良——日本入明贡船两	
使节.....	(158)
戚继光在山东的备倭活动	(169)

明清之际儒学东渐及其影响·····	(175)
第三章 明代与周边邻国的关系·····	(191)
明初中越关系与成祖征安南之役·····	(191)
从苏禄国王访华看明朝与苏禄关系 ·····	(218)
明朝与八百媳妇国关系析论·····	(225)
论明代援朝战争中的和议问题·····	(238)
略论明朝与撒马尔罕的关系·····	(261)
第四章 明代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271)
明代中葡关系与澳门问题·····	(271)
明后期与吕宋的贸易及早期中西关系 ·····	(291)
明末闽台海峡局势与中荷关系·····	(305)
利马窦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320)
后记·····	(339)

导 言

明代中外关系史，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但是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史上，则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

其一：在明代260余年的对外交往中，所涉及的国家之多、地域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仅从明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来看，其足迹就遍及东南亚、印度洋、红海、波斯湾30多个国家 和地区。另外如朝鲜、日本、琉球、安南（今越南北部）、缅甸、老挝、真腊（今柬埔寨）、蒙古、撒马尔罕（今独联体中亚诸国）、哈烈（今阿富汗）、白葛达（今伊拉克）、米昔尔（今埃及）、拂菻（今土耳其）及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意大利都在明代不同时期与中国发生过不同形式的联系。一些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安南、缅甸、暹罗（今泰国）、吕宋（今菲律宾）等几乎自始至终与明朝保持着联系与交往。据各种史籍统计，与明朝发生联系的国家多达六七十个，因此可以说明代对外交往在整个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是继唐朝以后的又一个高潮时期。

其二、在明代中外关系史上，中外交往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其中包括中外之间官方便团的互访和经济交流，中外民间人士之间包括经商、求学、传经送道等各种交流。明朝许多官员和僧侣、文人、工匠、商人等各界人士遍游各国或进行访问考察，还有因失去土地无以为生的农民去海外谋生。他们通过不同方式把先进的中国文化和生产技术传播到各国，特别是对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文化

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样，一些外国各界人士包括明后期的西方传教士到中国访问、求学、经商或传教，也把外国的一些先进科技知识传入到中国，对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外文化交流也做出了贡献。

在明代二百多年的中外关系史上，明朝政府与外国政府之间友好和睦相处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不可否认，明朝与外国之间，也曾发生过一些战争与争端。但明朝卷入战争，多数是被迫进行的。如明初对蒙古的反击战、明代御倭战争、万历年间的援朝战争、明末在东南沿海地区反击西方殖民者入侵的战争，均属于这种性质。这些战争的胜利，保障了国家的安定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也有少数战争，如明成祖时期与安南发生的战争，情况比较复杂，还要做具体的分析，不宜轻易肯定或否定。

其三，与历代相比，明朝对外政策更为宽和并且变化不大。中华民族历来有友好外交的传统，明王朝建立后，沿袭了这一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外交政策。虽然明朝皇帝也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中心之国的天朝君主，把周边国家认作是“夷狄”之邦，以满足自己君临四方、高高在上的心理，尽管与周边邻国相比较，明朝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上都具有压倒优势，但是明王朝并没有制订与推行武力对外扩张政策，对邻国“凡不为中国之患者，决不伐之。”强调与各国“相安无事，”以“共享天下之福。”明朝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是在政治上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和睦相处，在经济上厚往薄来，并不计较贸易得利多少。即使与邻国发生冲突，也多以忍让为重，做到“驭夷之道，守备为重，一衅而去者不穷追之，诚虑耗费弊之中国大也。”就以上而言，已足见明统治者在对外交往中有着宽大的胸怀。因此，明朝赢得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

广泛的友谊和信赖。

如果说明朝在与外国的交往中尚能推行宽和政策的话，那么对待民间的中外交往，则采取了反其道而行之的政策。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自始至终颁布海禁令，严格限制人民群众去海外经商和求生存发展。其禁令之严，甚至到了连沿海居民出海捕鱼也受到种种限制。隆庆年间以后，虽然有所缓和，但海禁政策终明之世也未能取消。这种海禁政策带来许多消极后果，不仅影响了中外人民之间的正常交往，妨碍了明政府对世界发展趋势的认识和了解，而且削弱了国力，赶不上世界蓬勃发展的潮流，使明政府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日益削弱，并导致明后期西方殖民者能够畅通无阻地控制东南亚地区，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

其四，与历代封建王朝相比，明朝的涉外机构日趋完备和扩大。如明代的会同馆一次能接待上千外国来宾且井然有序地安排外人食宿，这在以往各朝代中均是少见的。四夷馆作为培养外事翻译人才的机关，可以培养十几种语言的翻译人才。市舶司、行人司则在对外贸易和派遣使节中都能发挥自己的功能。尽管明代的外事机构中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中央主管部门与各外事机构的责任分工也有不协调之处，但明朝的外事机构在对外交往中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功不可泯。

其五，在明代中外交往史上，一些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如郑和七下西洋，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沟通了中国与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发展了相互间的友好关系，又如万历年间礼部尚书徐光启，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技、文化典籍，向国人介绍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再如明末著名思想家朱舜水，把经世致用等儒学思想传播到日本，在日本办学授课，对日本思想界的进步起了很

大推动作用。另外还有一些出使外国的使节、到外国的商人、工匠及其它学有专长的人士，虽然大多名不见经传，但在发展与外国的交往中，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也是应充分加以肯定的。

其六，在明代，由于中外交往的频繁，还出现了多种介绍外国历史和中外交往历史的文献典籍。这类文章书籍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也是前所未有的。其中价值较高的如随郑和使团下西洋的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揽》、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以及张燮的《东西洋考》、郑舜功的《日本一鉴》、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黄省吾的《西洋朝贡典录》、陈诚的《使西域记》等等。这些著作多为作者亲身经历，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是后人研究14~17世纪外国状况和中外关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其中有些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外国出版发行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纵观明代中外关系史，堪称是一段丰富多彩的历史。因为明清时期已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所以明代的中外关系史对清代及近现代中外关系也有很大的影响。就具体问题而言，明代推行的海禁政策到清代仍然沿袭下来并且更甚于明代，清代曾多次颁布迁海令，禁止民间百姓到海外与外人往来，仅开辟广州一港为通商口岸，把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才被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又如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是自明代开始，到清代发展的更为频繁。从明朝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初占中国领土澳门，到近代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从明后期中国社会初步接触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和思想、伦理，到近代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学习西方，推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虽然相距二三百年的时间，但很难说没有前因后果之联系。再如中国人民反对西方殖民者

的斗争，开始于明正德年间，中国领土沦为殖民地，始之于明代之澳门，继而清代之香港。可以这样认为，只有当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才标志着中国人民自明代开始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明代中外关系史问题众多，绝非一部二十几万字的书可以写完。本书中涉及的若干明代中外关系史上的问题只能是蜻蜓点水般作一点肤浅的探讨，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盼望有更多更好的大作问世，把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章

明朝对外政策、外事机构 与外交使节

明初外交政策制订及发展演变

明代，是中国二千年封建时代历史上对外交往的一个高潮时期，就这段时期而言，无论是中国与之交往的国家之多、地域之广阔、内容之丰富、变化之多端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如明初郑和下西洋，明中叶之对外贸易，倭寇问题，明末之中西文化交流等，不仅在当时为世人所瞩目，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处理不同时期国与国的关系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成功或失败，归根到底，应取决于外交政策的正确与否。明朝存在的260多年间所推行的外交政策，虽在不同时期在具体内容上有些不同的变化，但其指导思想和主要方针并无变化，是在明初洪武、永乐两朝制订的，并长期沿袭下来。分析研究洪武、永乐二朝对外政策，对整个明代外交指导方针将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